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父母应对社会化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基于长时与实时时间轴的视角

作者：何婷，胡惠南，乔璐，杨靓靓，李明英，蔺秀云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综述系统阐述了父母应对社会化的测量，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及其机制。该综述关注的研究问题较为重要，而且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已有文献，对未来研究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但同时，论文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意见 1：根据图 1，外显式应对社会化被进一步区分为参与式和脱离式，但文中的描述不够明确。图中的 coaching（训练）和 modeling（示范）的翻译不恰当。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指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概念的含义。为确切地翻译 coaching 和 modeling，我们将从概念含义及前人研究两个角度加以考虑。

首先，在概念含义方面，Kliewer 等人(2006)认为，coaching 是指抚养者就儿童如何看待（评估）或应对（处理）某种情境提供的直接建议。例如，抚养者可能会建议孩子充分利用可用资源来应对问题。或者，抚养者可能会建议孩子采纳某种特定的行动策略（比如，来和我聊一聊；思考你可以采取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coaching 似乎意味着抚养者直接教导儿童如何应对困境。

而 modeling 涉及儿童观察到的抚养者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一情境的评估和应对行为。例如，儿童可能观察到抚养者经常对某种情境持过度悲观的态度，或者表现出寻求支持的应对行为(Kliewer et al., 2006)。由此，modeling 指的是儿童观察父母自身应对问题的过程。

其次，查阅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在家庭社会化领域，研究者们倾向于将 coaching 翻译为“教导”，将 modeling 翻译为“模仿”（刘航 等, 2019）。例如，在情绪社会化研究中，研究者将 emotion coaching 译为“情绪教导”（何晓丽 等, 2020; 梁宗保 等, 2020）。

综上，我们决定将 coaching 和 modeling 分别译为“教导”和“模仿”，以更贴切地表达原文意义。

参考文献

Kliewer, W., Parrish, K. A., Taylor, K. W., Jackson, K., Walker, J. M., & Shivy, V. A. (2006).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with community violence: Influences of caregiver coaching, modeling, and family context. *Child Development*, 77(3), 605–623.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6.00893.x>

何晓丽, 袁小龙, 胡铭, 周丽晨. (2020).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08), 971-981.

梁宗保, 严嘉新, 张光珍.(2020).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 父母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03), 608-614.

刘航, 刘秀丽, 郭莹莹. (2019). 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 因素、机制与启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 148-155.

意见 2: 文中仅介绍了英文问卷, 未对中文问卷进行综述。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 发现当前的国内研究尚未涉及“应对社会化”这一主题, 目前还没有关于“应对社会化”的中文量表。同时, 我们的团队正在进行应对社会化中文修订工作。由此, 先前的稿件并未包含中文问卷的综述。

此外, 根据其他审稿专家的建议, 新版本中我们删减了应对社会化测量方法的部分, 以更突出综述主题, 详见正文部分。

意见 3: 针对“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一论点, Tu 等 (2020) 的研究只是纵向预测关系, 并不能说明关系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回应: 谢谢您的提醒。在修改稿中, 我们对此进行了修改:

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则通常会加剧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病理症状, 如抑郁情绪、外化问题行为(Abaied & Rudolph, 2010a)、情绪失调(Peisch et al., 2020)、消极应对(Tu et al., 2020)和同伴交往问题(Abaied & Stanger, 2017) (见第 3 页 2.1 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第 2 段)

意见 4: 父母性别改为“父亲与母亲”可能更为合适。

回应: 非常感激您的认真审阅和建设性意见。遵照您的建议, 我们已将“父母性别”改为了“父亲与母亲角色”。

意见 5: 从图 2 来看, 背景因素并不是调节变量, 而是通过应对社会化训练(coaching)、示范(modeling)和情境(context)间接影响儿童适应。请作者澄清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回应: 感谢您的仔细审阅。您对图 2 的解读与 Kliewer 等人(2006)所述的应对社会化过程理

论模型是一致的。Kliewer 等人(2006)认为,背景因素,包括儿童青少年自身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照顾者的特征,如人格、价值观等,以及家庭环境,如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会影响抚养者的应对社会化教导(coaching)、儿童对抚养者应对行为的模仿(modeling)以及家庭环境,而教导、模仿与家庭环境又进一步影响儿童应对过程与适应。

为更清晰地传达理论模型的含义,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上述三个部分也均会受到一些背景因素的影响,包括儿童青少年自身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照顾者的特征,如人格、价值观等,以及家庭环境,如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即,这些背景因素会影响抚养者的应对社会化教导、儿童对抚养者应对行为的模仿以及家庭环境,而教导、模仿与家庭环境又进一步影响儿童应对过程与适应。(见第 5 页 3.1 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第 5 段)

事实上,Kliewer 等人(2006)的模型主要集中于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并未深入探讨其中可能的调节因素。这是其理论的一大局限性,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一点作了相应讨论(见第 6 页 3.1 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第 7 段):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之一在于,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适应的过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儿童因素,如性别(Kliewer et al., 1996; Peisch et al., 2020; Tu et al., 2021)、生理反应(Stanger et al., 2018)、精神病理症状(Butterfield et al., 2019);父母因素,如父亲/母亲角色(Tu et al., 2020)、精神病理症状(Monti et al., 2014; Watson et al., 2022);和压力源的特征,如类型和严重程度等(Abaied & Rudolph, 2010; Watson et al., 2022)。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仅提及背景因素对于应对社会化本身的作用,未能涉及对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影响,无法解释相同类型、相似水平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在不同背景下,对不同青少年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不同的效应。

意见 6:“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则是指,不论压力水平高或低,父母应对社会化均能预测青少年适应,但预测的方向存在差异”,该句话中的预测方向存在差异具体指什么?是否有实证研究支持放大效应和差异效应模型?在介绍压力源这一影响因素时似乎提到过,请作者做进一步的梳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两个关键问题。

① 对于“预测方向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以期减少读者困惑,消除潜在的歧义:

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则是指，在高压力和轻度压力的情境下，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性有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体验到轻度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会显著预测其精神病理症状加剧，而对于体验到高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其精神症状的减少。(见第7页3.2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第1段)

② 对于实证研究证据这一问题，教养×压力放大和差异效应模型的核心观点已得到初步实证支持(Abaied & Rudolph, 2010a; Watson et al., 2022)，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以确保论述清晰。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3.2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压力的调节作用

针对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的主要不足，Abaied 等研究者(2010a)提出了父母应对社会化效应的两种模型：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parenting×stress amplification effects model)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parenting×stress differential effect model)。他们认为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青少年体验到的压力源类型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认为，在轻度压力水平的青少年中，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青少年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应对压力，但在高度压力下，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作用将得到增强。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则是指，在高压力和轻度压力的情境下，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性有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体验到轻度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会显著预测其精神病理症状加剧，而对于体验到高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其精神症状的减少。

此两种模型的核心观点已得到初步实证支持。Abaied 和 Rudolph(2010a)发现，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仅适用于人际关系压力，当青少年体验到轻度人际压力时，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当青少年体验到高水平人际压力时，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显著预测男生更多的外化问题和女生更少的外化问题。但在另一项研究中，Watson 等学者(2022)采用话题讨论任务调查母亲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发现在母亲报告的孩子高同伴压力下，母亲在互动中采用较少的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孩子将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问题，低同伴压力下，母亲的应对社会化行为无显著效应。而在孩子报告的低同伴压力下，母亲在互动中采用较多的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孩子将表现出更少的内化问题，高同伴压力下，应对社会化行为无显著效应。这一研究可以算作对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的补充与完善，即教养×压力的交互效应可能不仅仅出现在人际压力高的情境下，在验证该模型时应当综合采用问卷、行为观察、多角色

报告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则在非人际压力情境中得到了验证(Abaied & Rudolph, 2010a)，对于暴露在高水平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父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青少年一年后更高的外化问题，但暴露于轻度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这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了青少年一年后更少的外化问题。

不论如何，上述实证研究说明不同类型的应对社会化行为会依据压力源的特征(包括类型与严重程度)而发挥不同的作用。虽然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阐述了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但其只从压力源的角度揭示了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调节因素，模型涵盖内容并不全面，也未能涉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见第 6 页 3.2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

意见 7：“即在应对社会化领域检验强制理论(Patterson, 2001)”，该句话需要详细阐述，否则读者会很迷茫，什么是强制理论？

回应：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建议。社会强制理论(Patterson, 1982)强调儿童行为和父母教养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该理论提出，父母和儿童之间存在负反馈循环，这体现了亲子之间相互强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的问题行为触发了父母消极的教养行为，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儿童更多的问题行为。当然，父母和儿童之间也可能存在正反馈循环。具体来说，儿童的适应性行为表现可能会唤起父母积极教养行为，这进一步促进了儿童的适应性发展。

在修改稿中，我们根据另一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章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社会强制理论”的相关内容已被删除。

意见 8：作者提出的模型如何将已有的两个模型进行融合？从图 3 来看，更像是一个大杂烩，将各种因素放在了一起，但并没有将内在机制阐述得更清楚；而且看起来不够简洁。例如，互动同步性似乎是一个调节变量，而非中介变量，即同步性高时，父母应对行为对儿童的情绪调节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更大；当同步性低时，影响较小或不存在。

回应：特别感谢您这一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模型的构建和呈现方式。

① 首先，对于模型融合这一问题，我们从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这两个角度对已有的两个理论模型进行了整合。相关内容阐述如下：

3.3.1 应对社会化理论的整合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与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分别从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角度解释了应对社会化行为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结合现有实证研究，此两种理论似乎可以相互完善与整合(见图 3)。首先，在作

用机制方面，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提出，而儿童青少年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应对过程既包含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也包含调节方式(Szkody et al., 2020)。

其次，在边界条件方面，结合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与相关研究成果，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儿童应对过程和长期适应，以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均可能受到父母因素(Tu et al., 2020)、儿童因素(Butterfield et al., 2019; Tu et al., 2021)以及压力源特征(Watson et al., 2022)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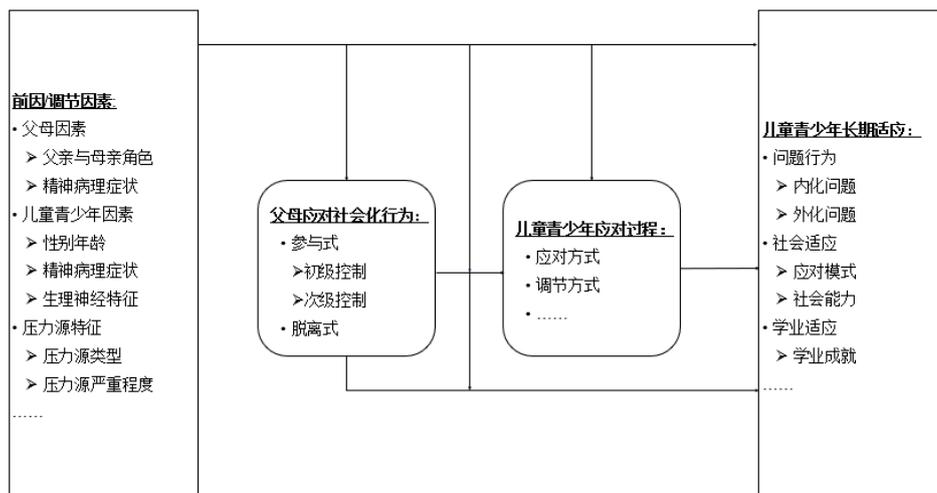


图 3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与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的整合
(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整理所得)

整合后的模型主要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角度来探讨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其本身可为我们阐明应对社会化的核心效应提供洞见，但整合后的模型仍然有所滞后，难以完整描述其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具体来说，目前，关于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有三大取向：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研究，基于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的研究，以及将两种时间轴加以结合的研究。但整合后的模型主要侧重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

随着研究的进展，其在描述不同时间轴上的应对社会化作用时，似乎有些局限。因此，本研究基于动态系统的视角，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对整合后的模型再次进行补充与拓展，以期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② 由此，对于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内在机制阐述的问题，我们在修订稿中，主要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来阐述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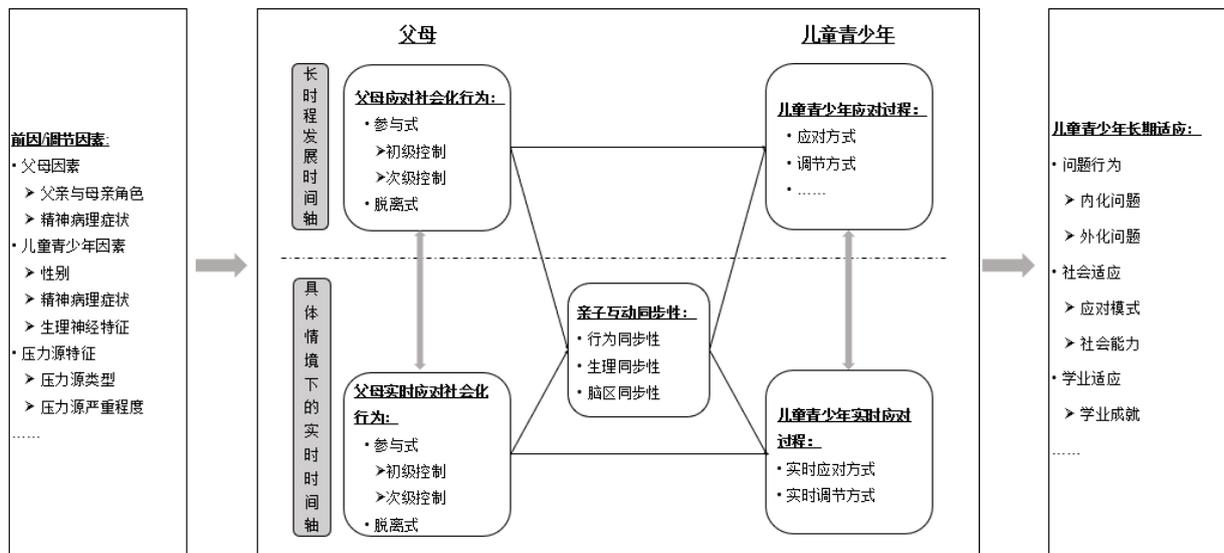


图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研究提出，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沿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 (Kliewer et al., 2006)，父母日常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通过儿童日常的应对过程(包括应对方式和调节方式)间接预测儿童长期适应；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可以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时的亲子行为与神经生理同步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实时时间轴上的亲子互动可以进一步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的适应性发展。

该模型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 前因/调节因素：如前(理论的整合)所述，结合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成果，该模型从父母因素、儿童因素以及压力源特征等角度考虑了前因/调节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作为前因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儿童应对过程及其长期适应，也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应对过程及适应性发展之间关系的强度与方向。

(2) 潜在作用机制：模型不仅沿袭以往研究的关注点，关注父母日常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更从动态实时互动的视角出发，关注亲子二元实时应对互动状态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首先，基于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该模型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提出儿童的应对过程(包含应对方式和调节方式等)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其次，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该模型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假设在实时的应对互动过程中，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儿童

青少年实时应对过程，还会通过亲子之间行为、生理与神经同步性间接影响儿童实时表现，并持续影响其一系列长期发展结果。

(3) 不同时间轴上作用过程的关系：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实时时间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与实时时间轴的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相互关联；第二，两个时间轴上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也存在相互影响；第三，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也可以通过实时互动中亲子的二元同步性间接预测儿童青少年日常及实时应对过程(Lobo & Lunkenheimer, 2020;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2021)。实时时间轴是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具体体现，后者则是前者的累积结果(Lougheed, 2018, 2019; Lougheed & Keskin, 2021)，二者共同影响儿童的长期适应性发展。

③ 对于第三个问题，即模型简洁性的问题，我们主要从模型内容及呈现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优化。首先，在模型内容方面，我们根据审稿专家们的意见，重新审视了本篇综述的重点论题。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在现有理论模型基础上发展更完善的理论，以适应当前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趋势。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将结合应对社会化的理论和动态系统视角，综合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探讨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为更加聚焦该议题，我们删除了原先版本中关于亲子应对灵活性、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的神经生理反应等非关键部分(见上图)。

其次，在模型呈现方面，修订后的模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前因/调节因素，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实时时间轴的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为避免线条混乱，我们在正文中详述了作用机制(详见上一问题回复)。

希望修改后的模型可以更清晰、聚焦地展现应对社会化动态作用过程。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针对应对社会化在儿童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论述，审稿人的观点如下，仅供参考：

意见 1：最主要的问题是本文像是一个教科书式介绍，陷入了概念、测量、影响因素等的框架，不符合现在本刊综述的写法。好的综述不是要大而泛，而是应该抓住一个具体研究点，深入论述和挖掘，同时有作者自己的行文逻辑框架（即文章的章节应是作者自己叙述研究问题的各个点，目前的版本看起来是罗列），甚至从标题和摘要中无法明显看出这是一个综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这一意见十分具有启发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本篇综述的核心问题。

从现有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来看，当前应对社会化的理论发展似乎滞后，难以完整描述其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具体来说，目前，关于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有三大取向：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研究，基于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的研究，以及将两种时间轴加以结合的研究。然而，主流的理论模型，如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主要侧重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随着研究的进展，现有理论在描述不同时间轴上的应对社会化作用时，似乎有些局限。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理论模型基础上发展更完善的理论，以适应当前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趋势。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将结合应对社会化的理论和动态系统视角，综合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探讨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补充和拓展当前的理论模型，并为探索父母应对行为对青少年适应机制提供新方向。

据此，我们对文章进行了大幅修改，重新架构逻辑框架、组织主体内容，删除了原有的“结构、测量、影响因素”等内容，紧扣“不同时间轴下应对社会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这一主题，采用“概念含义—直接关系(2 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包括 2.1 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2.2 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2.3 跨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作用机制(3 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包括 3.1 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3.2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3.3 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理论整合与拓展)—模型构建(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未来展望”的逻辑链条，立足于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尝试对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整合与拓展，以期对今后应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方向指导。

此外，遵照您的建议，结合本文的核心问题，我们修改了文章的标题与摘要，如下：

父母应对社会化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基于长时与实时时间轴的视角

摘要 应对社会化是指父母向儿童青少年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策略以应对压力的过程。实证研究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及不同时间轴的结合等角度探讨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揭示了应对社会化对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独特效应。对于其中的心理机制，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探讨了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在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教养×压力放大和差异效应模型考察了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将此两种模型进行整合，并基于动态系统视角提出应对社会化动态过

程理论模型，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两个层面完善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未来研究可从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等层面考察应对社会化作用效果的普遍性，深化探索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及二者的纵深关系，为应对社会化在家庭教育与临床干预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意见 2: 应对社会化当前的主要研究问题和争议是什么？这可以是作者修改论文主要思考的地方，目前没有看到重点在哪里，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的介绍，结构和测量以及影响因素部分尤其明显。

回应: 您的这一建议让我们受益匪浅。通过综述现有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应对社会化当前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父母应对社会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适应性，哪些因素在这过程中起作用。

但目前关于应对社会化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存有较大局限。

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不同时间轴的研究结果尚需整合。研究者主要从三个维度探讨了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基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及两者的结合。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应对社会化核心效应的理解。但基于不同研究取向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不同时间轴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是否存在一致性或具备特异性？这些问题仍需深度剖析。

其次，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仍需明晰。Kliewer 等人(2006)提出的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中，强调儿童应对过程在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起到的解释性作用。但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应对行为等同于应对过程(Abaied & Rudolph, 2011; Tu et al., 2020)。然而，应对过程实际上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如情绪调节(Eisenberg, 2009)等方面。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父母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在预测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方面的重要性(Peisch et al., 2020)。最近，Szkody 等人(2020)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积极的应对社会化能够预测儿童较少的调节困难，并减轻他们在经历社交排斥后的消极情绪。由此，需进一步明确“儿童应对过程”的内涵，解析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指明方向。

在理论方面，首先，当前有关应对社会化的理论各有出发点和侧重点，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例如，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指出了父母应对社会化对于儿童适应的作用机制，但只聚焦儿童应对过程这单一因素阐述作用机制，对于“应对过程”的界定不清，较为宏观和笼统；教养×压力放大和差异效应模型强调了压力源类型和严重程度的影响，但并未具体陈述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

其次，尽管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已为我们阐明应对社会化的核心效应提供了洞见，但无论是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还是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都主要基于长时程发展

时间轴来研究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随着研究深入，这些理论模型逐渐显得与现行研究视角不尽匹配，尤其在阐释应对社会化在不同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上存在局限。

根据以上思考，结合您的建议，我们重新撰写和组织主体内容，聚焦关系(2 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与机制(3 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两方面内容，旨在现有理论模型基础上发展更完善的理论(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以适应当前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趋势，并为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意见 3: 理论模型部分其实可以深入挖掘各理论模型的来龙去脉，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争议、补充，而作者在这方面的梳理和述评比较单薄，后面自己提出的模型也没有看到很多实证依据的支持。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这一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依照您的意见，我们对已有理论模型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模型构建这两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正。

① 首先，在已有理论模型关系方面，我们重新挖掘了现有的两个理论模型(即，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的来龙去脉，并进一步探讨了两个模型之间相互补充，彼此完善的可能性。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3.1 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儿童应对过程的中介作用

Kliewer 等人(2006)针对父母如何帮助儿童应对社区暴力的问题，提出了关于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理论模型(见图 2)，该模型由三个部分组成：应对社会化教导(coaching)、模仿(modeling)和情境(context)。应对社会化教导与 Abaied 等人(2010)提出的参与式和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相似，其是指父母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儿童青少年应对技能和策略选择的外显方式之一，是父母最明确地促进儿童青少年应对策略社会化的方式。当儿童青少年自己的应对策略被耗尽或无效，抑或是处于新的压力情境中时，来自父母的应对建议就显得尤为有效。父母能够为儿童青少年给予适当的支持，并提供新的应对策略建议，引导儿童应对当前的压力和困境。

模仿，指的是儿童青少年通过观察父母应对压力的方式，逐渐内化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主要是基于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提出的，且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自身的应对方式可以显著正向儿童青少年的应对方式(Meyer et al., 2014)。类似的，Kliewer 等人(2006)调查了 101 名非裔美国青少年及其母亲如何应对社区暴力，并将模仿作为母亲应对社会化的指标加以考察。结果发现，如果母亲采用攻击性的应对策略应对社区暴力，那么其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也更有可能使用攻击性的策略应对社区暴力。

第三个部分即情境,其主要指的是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的质量。Kliewer 等人(2006)将其作为该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因为,他认为在向儿童青少年传递应对建议,或教授应对策略时,亲子之间需要较多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与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亲子关系的质量和家庭环境在父母应对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于 Kliewer 等人(2006)的观点,这三个部分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一些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相互影响和促进。例如,应对社会化教导与模仿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向儿童青少年传递特定应对策略建议的父母自己可能也倾向于使用这些策略。再如,凝聚力强、冲突程度低、善于沟通的家庭环境将强化父母的应对社会化教导,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减少孩子的压力水平,促进其选择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

上述三个部分也均会受到一些背景因素的影响,包括儿童青少年自身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照顾者的特征,如人格、价值观等,以及家庭环境,如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即,这些背景因素会影响抚养者的应对社会化教导、儿童对抚养者应对行为的模仿以及家庭环境,而教导、模仿与家庭环境又进一步影响儿童应对过程与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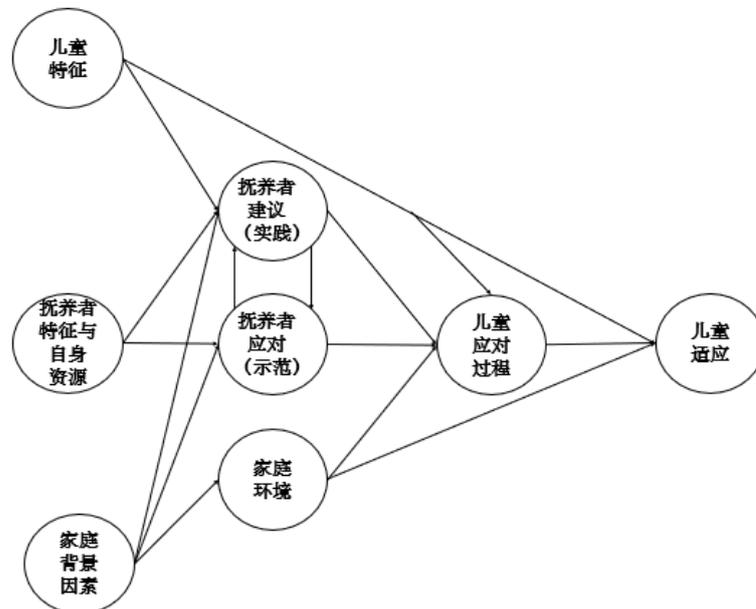


图 2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

Kliewer 等人(2006)在提出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后,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邀请亲子完成搭积木任务和同伴冲突话题讨论任务,基于任务录像编码父母的应对社会化与儿童应对行为。结果发现父母在实时互动中表现出的积极(问题导向)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儿童问题导向的应对行为,进而促进儿童在六个月后的学业成绩和自尊心的提高,缓解内化问题行为和创伤后应激症状;父母主动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积极主动的应对行

为，并进一步预测儿童六个月后的自尊心和社交技能的提高。总之，实证证据初步证实了应对过程理论，验证了儿童应对过程在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适应中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之一在于，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适应的过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儿童因素，如性别(Kliewer et al., 1996; Peisch et al., 2020; Tu et al., 2021)、生理反应(Stanger et al., 2018)、精神病理症状(Butterfield et al., 2019)；父母因素，如父亲/母亲角色(Tu et al., 2020)、精神病理症状(Monti et al., 2014; Watson et al., 2022)；和压力源的特征，如类型和严重程度等(Abaied & Rudolph, 2010a; Watson et al., 2022)。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仅提及背景因素对于应对社会化本身的作用，未能涉及对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影响，无法解释相同类型、相似水平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在不同背景下，对不同青少年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不同的效应。

其次，目前对儿童应对过程的界定尚不明确。在 Kliewer 等人(2006)及随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应对行为等同于应对过程(Abaied & Rudolph, 2011; Tu et al., 2020)。然而，应对过程实际上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如情绪调节(Eisenberg, 2009)等方面。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父母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在预测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方面的重要性(Peisch et al., 2020)。最近，Szkody 等人(2020)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积极的应对社会化能够预测儿童较少的调节困难，并减轻他们在经历社交排斥后的消极情绪。由此，需进一步明确“儿童应对过程”的内涵，解析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指明方向。

3.2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压力的调节作用

针对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的主要不足，Abaied 等研究者(2010a)提出了父母应对社会化效应的两种模型：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parenting×stress amplification effects model)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parenting×stress differential effect model)。他们认为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青少年体验到的压力源类型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认为，在轻度压力水平的青少年中，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青少年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应对压力，但在高度压力下，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作用将得到增强。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则是指，在高压力和轻度压力的情境下，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性有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体验到轻度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会显著预测其精神病理症状加剧，而对于体验到高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其精神症状的减少。

此两种模型的核心观点已得到初步实证支持。Abaied 和 Rudolph(2010a)发现, 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仅适用于人际关系压力, 当青少年体验到轻度人际压力时, 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 当青少年体验到高水平人际压力时, 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显著预测男生更多的外化问题和女生更少的外化问题。但在另一项研究中, Watson 等学者(2022)采用话题讨论任务调查母亲的应对社会化行为, 发现在母亲报告的孩子高同伴压力下, 母亲在互动中采用较少的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 孩子将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问题, 低同伴压力下, 母亲的应对社会化行为无显著效应。而在孩子报告的低同伴压力下, 母亲在互动中采用较多的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 孩子将表现出更少的内化问题, 高同伴压力下, 应对社会化行为无显著效应。这一研究可以算作对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的补充与完善, 即教养×压力的交互效应可能不仅仅出现在人际压力高的情境下, 在验证该模型时应当综合采用问卷、行为观察、多角色报告等多种研究方法, 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则在非人际压力情境中得到了验证(Abaied & Rudolph, 2010a), 对于暴露在高水平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 父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青少年一年后更高的外化问题, 但暴露于轻度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 这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了青少年一年后更少的外化问题。

不论如何, 上述实证研究说明不同类型的应对社会化行为会依据压力源的特征(包括类型与严重程度)而发挥不同的作用。虽然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阐述了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但其只从压力源的角度揭示了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调节因素, 模型涵盖内容并不全面, 也未能涉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

3.3 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理论整合与拓展

3.3.1 理论的整合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与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分别从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角度解释了应对社会化行为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结合现有实证研究, 此两种理论似乎可以相互完善与整合(见图 3)。首先, 在作用机制方面,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提出, 儿童青少年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 此应对过程既包含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 也包含调节方式(Szkody et al., 2020)。

其次, 在边界条件方面, 结合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与相关研究成果, 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儿童应对过程和长期适应, 以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均可能受到父母因素(Tu et al., 2020)、儿童因素(Butterfield et al., 2019;

Tu et al., 2021)以及压力源特征(Watson et al., 2022)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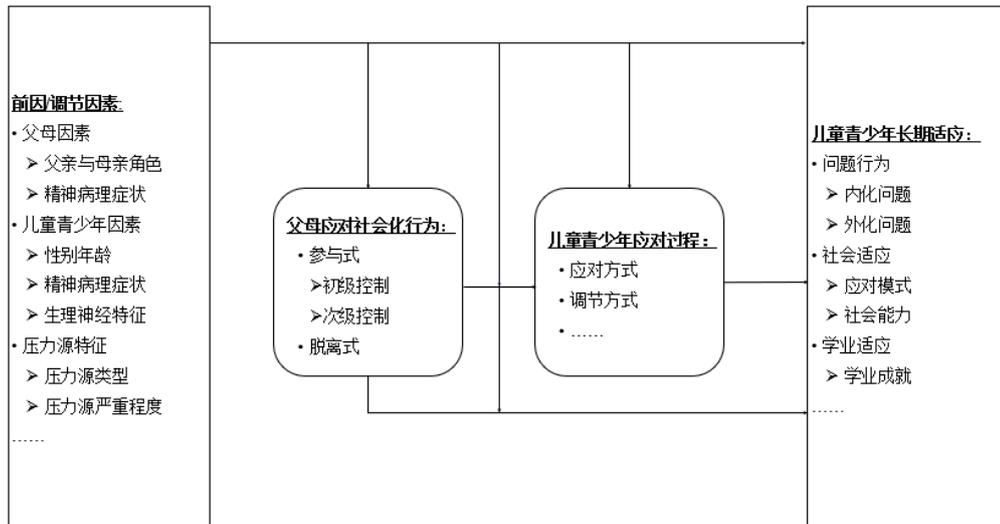


图3 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与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的整合

(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整理所得)

② 其次，在新模型构建方面，整合后的模型主要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角度来探讨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其本身可为我们解明应对社会化的核心效应提供洞见，但随着研究深入，此理论模型逐渐显得与现行研究视角不尽匹配，尤其在阐释应对社会化在不同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上存在局限。

因此，本研究基于整合后的理论模型，采用动态系统的视角，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对整合后的模型再次进行补充与拓展，以期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在修改稿中，我们增加了“3.3.2 理论的拓展”部分，详细论述了基于动态系统视角，从实时时间轴上探讨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可能性及潜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的构建”。相关内容修改如下：

3.3.2 应对社会化理论的拓展

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应对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家庭社会化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们不断变换视角，更新研究方法，从行为层面和生理神经层面测查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关系。尽管现有理论与研究为我们阐明应对社会化的核心效应提供了洞见，但无论是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还是教养×压力放大/差异效应模型，都主要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来研究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模型逐渐显得与现行研究视角不尽匹配，尤其在阐释应对社会化在不同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上存在局限。因此，本研究基于动态系统的视角，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对上述模型进行补充与拓展，以期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Kunnen, 2018; Smith & Thelen, 2003)是应对研究的一个总体性发展理论。动态系统理论强调连续交互和嵌套过程。具体来说，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中的变化，而发展就是系统的所有层次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继而涌现的产物(Bülow et al., 2022)。个体的发展应当被视为嵌套的过程，不同层次在诸多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从毫秒到年)相互作用和自组织。因此，研究者应当在具体的情境中考察亲子之间的实时互动，并在这样的实时互动过程中研究儿童的发展(Bülow et al., 2022)。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父母社会化的过程是基于具体的亲子互动情境，不断动态变化的，儿童青少年正是在每一次的亲子实时互动中习得应对技能，形成自身稳定的应对模式，进而影响长期适应性发展。

那么在实时互动中，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行为是如何影响儿童实时的应对行为呢？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随着动态系统理论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在实时互动中考察亲子二元动态行为过程与互动模式，并提出了一些科学可验证的理论模型。其中亲子情绪调节动态模型(Parent-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Dynamics Model, Morris et al., 2018; Ratliff et al., 2022)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Lindsey, 2022;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Scholtes et al., 2021)。该模型主要关注亲子的实时动态互动在塑造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着重强调亲子二元的行为、生理与脑区同步性的介导机制，这进一步促进了研究者从更深层次理解亲子二元实时互动的本质。该模型已经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Lobo & Lunkenheimer, 2020;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2021; Reindl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21)。

与情绪调节相一致，应对也具有动态性与二元互动性(Eisenberg, 2009; Skinner & Zimmer-Gembeck, 2007)。父母与儿童青少年在日常的每一次实时互动中表达与传递应对方式。儿童青少年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持续性经验中习得应对策略，逐渐形成和稳固自己的应对模式，并对自身的适应性发展产生长期影响(Stanger, 2019)。而在亲子实时互动过程中，亲子二元在行为和神经生理层面均表现出同步性，正是这种多模态的同步性支撑并促进亲子二元的应对动态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的应对社会化过程也会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基于动态系统视角，关系(如亲子关系)是由个体和个体之间跨时间(例如，时刻，天，年)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的(Lougheed, 2018, 2019; Lougheed & Keskin, 2021)，而应对过程则是在当下的亲子关系之间共同构建的。二元关系状态随时间变化，在关系内的反复互动中，会出现稳定的亲子应对互动模式，并影响未来的二元互动动态和儿童青少年适应性发展。初步的实证证

据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不仅可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及情绪与行为状态(Stanger, 2019)，也会影响儿童后期的适应性(Butterfield et al., 2019; Stanger et al., 2018)。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的整合与拓展，结合父母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相关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模型：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见图 4)，该模型整合了现有的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和动态系统理论，结合宏观和微观视角，提出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不同过程机制和潜在边界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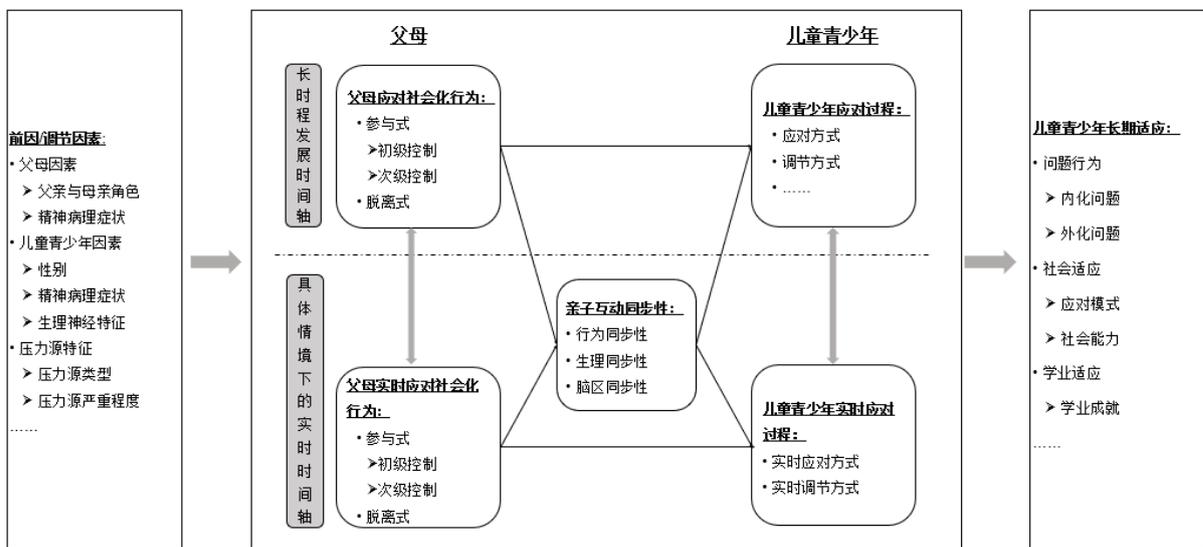


图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研究提出，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沿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Kliewer et al., 2006)，父母日常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通过儿童日常的应对过程间接预测儿童长期适应；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可以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时的亲子行为与神经生理同步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实时时间轴上的亲子互动可以进一步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的适应性发展。

该模型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 前因/调节因素：如前(理论的整合)所述，结合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成果，该模型从父母因素、儿童因素以及压力源特征等角度考虑了前因/调节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作为前因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儿童应对过程及其长期适应，也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应对过程及适应性发展之间关系的强度与方向。

(2) 潜在作用机制：模型不仅沿袭以往研究的关注点，关注父母日常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更从动态实时互动的视角出发，关注亲子二元实时应对互动状态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首先，基于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该模型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提出儿童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其次，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该模型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假设在实时的应对互动过程中，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实时应对过程，还会通过亲子之间行为、生理与神经同步性间接影响儿童实时表现，并持续影响其一系列长期发展结果。

(3) 不同时间轴上作用过程的关系：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实时时间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与实时时间轴的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相互关联；第二，两个时间轴上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也存在相互影响；第三，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也可以通过实时互动中亲子的二元同步性间接预测儿童青少年日常及实时应对过程(Lobo & Lunkenheimer, 2020;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2021)。实时时间轴是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具体体现，后者则是前者的累积结果(Lougheed, 2018, 2019; Lougheed & Keskin, 2021)，二者共同影响儿童的长期适应性发展。

意见 4: 未来研究展望部分太简单了，可以多思考增加几点，并且都应该基于已有研究基础，未来的思路应该有证据支持，目前看起来比较笼统且自说自话，实际上综述的这一部分占全文比例不会太低，当前内容比较少。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研究展望部分。

在修订稿中，我们基于社会化领域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重新撰写了研究展望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从研究背景和研究内容两个层面考察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

第二，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以及两个时间轴相结合的角度，验证、丰富与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第三，加强作用机制的纵深研究，一方面可纵向追踪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应对及适应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加大在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对亲子二元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研究，探索应对社会化的亲子双向作用模式，从而进一步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深化对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理解；

第四，促进研究成果的实际运用，一方面可基于健康群体和特殊群体开展应对社会化的干预训练，另一方面可采用无创神经干预技术(例如，经颅磁刺激技术，生物反馈训练)，考

察亲子同步性相关的核心脑区激活及同步性改变是否因果性地影响应对社会化过程及其效果。

修改内容如下：

5.1 考察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

现有研究较为一致地表明参与式应对社会化对于儿童青少年适应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而脱离式应对社会化则存在破坏效应(Anderson et al., 2021; Tu et al., 2020)，但囿于研究群体与方法的局限性，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仍需探究。未来研究可从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两个层面深入探究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研究背景方面，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等外环境因素对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与效果的影响。例如，在西方社会，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是非适应的(Peisch et al., 2020)，与儿童青少年消极发展结果紧密相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适度的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是被社会所接纳的，正如人们常说“算了吧”、“看开点”、“顺其自然”等。西方关于参与式和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适应关系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应用到中国家庭，尤其是具有文化特色的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的作用？这些问题均值得探讨，未来研究可立足与中国文化背景，明确中国本土化父母应对社会化概念和结构，并进一步厘清中国父母应对社会化与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关系。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总结以往研究，学者大都从行为层面强调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儿童生理和神经活动(Butterfield et al., 2019; Stanger et al., 2018)。在生理反应层面，作为调节父母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性发展作用的因素之一，研究发现皮肤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Level Reactivity, SCLR)可能会增强或抑制儿童青少年对父母教养的敏感性。对于在挫折任务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 SCLR 青少年而言，父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预测学龄儿童六个月后的问题行为(Stanger et al., 2018)。与此相反，对于表现出较低 SCLR 的青少年而言，母亲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预测青少年更好的同伴适应。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 SCLR 说明青少年在应对压力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生理兴奋和焦虑，父母参与式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即鼓励青少年直面问题可能会加剧这种情绪；而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即建议青少年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挑战，或从压力中解脱，可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生理上的焦虑，从而促进其适应性行为的发展。相比之下，较低的 SCLR 可能反映了青少年生理唤起的不足，这类青少年对挑战性环境并不敏感。但奇怪的是，目前大部分研究都仅仅关注了 SCLR 这单一的生理指标。实际上，除了 SCLR，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RSA)和皮质醇

均可以作为儿童对压力反应的生理指标，其测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已经得到了其他领域研究成果的佐证(Davis et al., 2018; Obradović & Boyce, 2012)。多种生理指标的综合测查和相互印证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儿童生理特征对于应对社会化作用效果的影响。

在神经活动层面，目前仅有 Butterfield 等人(2019)针对焦虑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展开研究，并发现了两组差异。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程度越高，健康青少年的前岛叶和扣带回激活越低，说明健康青少年在面对威胁信息时可以有效应对，无需大脑过多参与调解；但是对于焦虑青少年，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程度越高，他们的前岛叶和扣带回的激活程度越高，说明焦虑青少年在面对威胁信息时，情绪唤起和反应更强烈，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应对。未来研究可充分利用功能磁共振等脑观测手段，揭示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生理与神经活动的影响，并构建行为与生理神经机制之间的关联性。

5.2 验证与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探究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应对技能、促进其长期适应性发展的关键手段，是洞察应对社会化家庭教育功能与临床干预价值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尚未发现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当前理论各有出发点和侧重点，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例如，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指出了父母应对社会化对于儿童适应的作用机制，但只聚焦儿童应对过程这一单一因素阐述作用机制，较为宏观和笼统；教养×压力放大和差异效应模型强调了压力源类型和严重程度的影响，但并未具体陈述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这两个模型仍需后续本土化研究的验证和拓展。当涉及不同时间轴时，应对社会化的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发生，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提出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强调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两个层面探讨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适应的关系。首先，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方面，研究沿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Kliewer et al., 2006)，提出儿童青少年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重要机制，这一过程受到父母因素、儿童因素及压力源特征的影响。其次，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方面，研究基于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相关理论，提出父母实时应对社会化可以通过亲子二元间的同步性影响儿童青少年实时的应对过程。但这一观点是否成立，需要未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考察。最后，在不同时间轴的关系方面，基于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理论，应对社会化在两个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Lougheed & Keskin, 2021; Ratliff et al., 2022)，这一观点能否经得起检验，也需

要未来研究予以充分探讨。

5.3 加强作用机制的纵深研究

应对社会化是一个持续且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体现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Kliewer et al., 1996)与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Morris et al., 2018)，但鲜有研究对其动态变化进行探讨。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Kliewer 等人(1996)在早年提出了父母与家庭影响儿童应对的理论模型(Theoretical Model of Parent and Family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Coping)。在该模型中，Kliewer 等人(1996)提出父母的指导和应对建议会对儿童的应对产生影响，同时，儿童的应对行为也可能会影响父母的应对建议，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但在 Kliewer 后期提出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中(Kliewer et al., 2006)，未提及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应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该假设仍需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并补充到现有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中。

在实时时间轴上，Skinner 和 Zimmer-Gembeck(2007)在其提出的应对的多水平适应系统模型中，强调在具体的特定情境下，先前的情境可以引发之后的应对反应，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往后的情境，类似的，个体先前的应对反应与之后的情境存在关联，进而影响了个体往后的应对反应。个体就是在这样持续性的实时应对中不断习得应对方式，稳固应对模式，最终影响其发展结果。基于此模型，亲子在实时的应对互动过程中，母亲的应对社会化与儿童的应对行为之间可能存在持续的相互作用，而这样的相互作用可以进一步预测儿童的长期适应性发展。

综上，未来研究一方面可纵向追踪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应对及适应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加大在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对亲子二元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研究，探索应对社会化的亲子双向作用模式，从而进一步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深化对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的理解。

5.4 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近年来，儿童因为不知道如何应对压力性事件而采取极端行为的案件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促进儿童有效应对与长期适应性发展是摆在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但目前尚无针对应对社会化的干预研究，研究者有必要将应对社会化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中去，从而在优化家庭教育的基础上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首先，本研究强调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应对与适应的重要作用，未来干预训练研究可针对健康群体和特殊群体展开。健康群体方面，教授父母应对社会化方法，发挥参与式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促进效应(Abaied & Rudolph, 2011; Abaied & Stanger, 2017)。同时，提示父母应当了解儿童青少

年的性格特质与心理健康状况(Butterfield et al., 2019; Stanger et al., 2018), 对儿童青少年经历的压力类型与严重程度等保持敏感(Abaied & Rudolph, 2010a; Watson et al., 2022), 灵活选择适宜的应对社会化方式。特殊群体方面, 或可以应对技能受损的焦虑(Butterfield et al., 2019)、抑郁患者为对象, 结合脑调控和应对社会化干预, 考察应对社会化的行为-脑干预在缓解症状、减少负性情绪、提升应对技能等方面的临床价值。

其次, 本研究提出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强调应对社会化的亲子实时动态互动性, 该视角提示抚养者和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关注亲子之间的实时互动, 重视在日常互动中建立良性的应对模式(Morris et al., 2018; Ratliff et al., 2022)。在这个过程中, 亲子同步性可能是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应对过程的重要机制, 因此, 未来研究可针对实证研究中发现的亲子同步性涉及的重要脑区, 创新性地采用无创神经干预技术(例如, 经颅磁刺激技术, 生物反馈训练), 考察核心脑区激活及亲子同步性改变是否因果性地影响应对社会化过程及其效果。

综上, 为促进儿童有效应对压力和长期适应性发展, 构建以家庭为单位、亲子两代共同参与的应对社会化教育机制十分必要。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感谢作者对论文的修改。我对作者第一轮问题的回答还是比较满意的。但针对一处细节, 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仍有疑问, 供作者参考。

意见 1: A 和 B 两段话看起来是矛盾的: A: “例如, 对于体验到轻度压力的青少年而言, 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会显著预测其精神病理症状加剧, 而对于体验到高压力的青少年而言, 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其精神症状的减少。” B: “教养 \times 压力差异效应模型则在非人际压力情境中得到了验证(Abaied & Rudolph, 2010a), 对于暴露在高水平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 父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青少年一年后更高的外化问题, 但暴露于轻度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 这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了青少年一年后更少的外化问题。”请作者进一步澄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指正。这里 A 句原本是针对前一句“教养×压力差异效应则是指，在高压力和轻度压力的情境下，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性有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影响。”的举例说明，但可能在含以上与后文 B 句造成矛盾。

遵照您的意见，在修改稿中，我们对此进行了修改，使其与后文 B 句的内容保持一致：

例如，对于体验到高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会显著预测其精神病理症状的加剧，而对于体验到轻度压力的青少年而言，应对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其精神症状的减少。(见第 7 页 3.2 第 1 段)

意见 2：目前作者将论文的重点放在“长时”（宏观）和“实时”（微观）两个视角。研究者确实可以从两种视角开展相关研究，但这两种视角似乎更多地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即长时视角主要聚焦于变量之间的纵向关系，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但这种方法只能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很难揭示父母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因此，才有必要开展实时视角的研究。实时视角则采用观察、实验等方法，从微观视角来解决内在机制的问题。从理论构建的角度来看，综述中提到的“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理论模型”和“教养×压力放大效应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都应当能够对“长时”和“实时”的研究结果提供相对合理的解释。如果只能解释长时研究结果，而不能解释实时研究结果，那就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或提出新的理论，并结合长时和实时的研究方法（视角）加以检验。这是我的个人理解，请作者判断是否合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这一意见十分具有启发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对于不同时间轴的阐述。

在之前版本的稿件中，我们试图从“长时”和“实时”两个角度拓展以往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但诚如您所说，综述中提到的“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理论模型”和“教养×压力放大效应和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都能够对“长时”和“实时”的研究结果提供相对合理的解释。由此，如果是基于研究方法，从不同时间轴的角度拓展原有理论模型似乎并不太必要。

我们重新梳理了理论逻辑，尝试从“亲子二元动态互动”与“不同时间轴作用机制的关联性与差异性”两个角度强调本研究模型构建的必要性。

首先，对于“亲子二元动态互动”，当前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主要从儿童个体(即，儿童应对过程)的角度阐述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这并不能完全捕获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过程。实际上，儿童的社会适应结果是由亲子二元互动过程决定的(Granic, 2005)，亲子互动过程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和转变，最终实现儿童社会适应质的变化(Lougheed & Keskin, 2021)。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母和儿童青少年的二元互动对社会化过程具有独特的贡献(Wilson & Durbin, 2013)，二元互动本身可能是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的独特

机制。

因此，本研究拟在原先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强调“亲子二元动态互动”这一关键因素在应对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遵照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基于亲子二元动态互动视角对以往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进行补充与拓展，以适应当前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趋势，并为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其次，对于考虑不同时间轴的必要性，应对社会化在两个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既存在关联性，也存在差异性。

因此，本研究拟在原先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考虑不同时间轴”的必要性。遵照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考虑不同时间轴必要性的论述。

在理论层面，该模型可以提示研究者从多个水平(儿童个体水平、亲子二元水平)、多个时间尺度(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探讨应对社会化过程；在实践层面，该模型可以帮助实践者结合父母日常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倾向以及亲子实时的动态二元互动过程，捕捉到儿童应对的早期模式，进而预测儿童适应风险，及时预防和干预。

参考文献

- Granic, I. (2005). Timing is everything: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from a dynamic systems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Review*, 25(3), 386–407. doi: 10.1016/j.dr.2005.10.005
- Lougheed, J. P., & Keskin, G. (2021). Parent-adolescent emotion dynamics at multiple time scales.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5(2), 125–131. doi: 10.1111/cdep.12409
- Wilson, S., & Durbin, C. E. (2013).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dyadic interaction: Parental and child bids and responsiveness to each other during early childhood.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9, 249–279. doi: 10.1111/merrpalmquar1982.59.3.0249

根据以上思考，结合您的建议，我们重新撰写和组织了 3.3.2 应对社会化理论的拓展，以及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希望更清晰、聚焦地呈现新模型构建的必要性及其主要内容。

3.3.2 应对社会化理论的拓展

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应对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家庭社会化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们不断变换视角，更新研究方法，从行为层面和生理神经层面测查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之间的关系。但当前的应对社会化理论模型主要存在两点不足。

第一，现有的理论模型主要从儿童个体的角度阐述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这并不能完全捕获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过程。实际上，儿童的社会适应结果是由亲子二元互动过程决定的(Granic, 2005)，亲子互动过

程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和转变，最终实现儿童社会适应质的变化(Lougheed & Keskin, 2021)。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母和儿童青少年的二元互动对社会化过程具有独特的贡献(Wilson & Durbin, 2013)，二元互动本身可能是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的独特机制。因此，本研究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基于亲子二元动态互动视角对上述模型进行补充与拓展，以适应当前应对社会化的实证研究趋势，并为明确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研究者推测亲子动态互动过程可能是父母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机制之一(Lunkenheimer & Dishion, 2009)，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Kunnen, 2018; Smith & Thelen, 2003)提出。动态系统理论是应对研究的一个总体性指导理论，其认为发展是系统的所有层次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继而涌现的产物(Bülow et al., 2022)。具体来说，来自父母和儿童青少年的行为输入会自组织成一个与父母个体或孩子个体不同的高阶二元系统(Granic & Patterson, 2006)。例如，当应用于应对社会化时，亲子之间积极的应对行为同步可以作为一种高阶二元动态过程，促进儿童的应对技能习得与长期适应性发展。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父母社会化的过程是基于具体的亲子互动情境，不断动态变化的，儿童青少年正是在每一次的亲子实时互动中习得应对技能，形成自身稳定的应对模式，进而影响长期适应性发展。这提示研究者应当在具体的情境中考察亲子之间的实时互动，并在这样的实时互动过程中研究儿童的发展(Bülow et al., 2022)。

随着动态系统理论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在实时互动中考察亲子二元动态行为过程与互动模式。研究者提出“亲子二元同步”可以作为亲子二元动态互动的有效指标(Morris et al., 2018; Perlman et al., 2022)，介导父母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过程。例如，亲子情绪调节动态模型(Parent-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Dynamics Model, Morris et al., 2018; Ratliff et al., 2022)关注亲子的实时动态互动在塑造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其着重强调亲子二元的行为、生理与脑区同步性的介导机制，这进一步促进了研究者从更深层次理解亲子二元实时互动的本质。该模型已经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Lobo & Lunkenheimer, 2020;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2021; Reindl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21)。

与情绪调节相一致，应对也具有动态性与二元互动性(Eisenberg, 2009; Skinner & Zimmer-Gembeck, 2007)。父母与儿童青少年在日常的每一次实时互动中表达与传递应对方式。儿童青少年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持续性经验中习得应对策略，逐渐形成和稳固自己的应对模式，并对自身的适应性发展产生长

期影响(Stanger, 2019)。而在亲子实时互动过程中, 亲子二元在行为和神经生理层面均表现出同步性, 正是这种多模态的同步性支撑并促进亲子二元的应对动态过程。在应对社会化过程中探讨亲子二元同步的作用机制可能具有重要且独特的意义。这是因为, 应对社会化过程涉及父母帮助儿童青少年应对压力和困境, 往往具有挑战性, 可以诱发目标导向的亲子互动, 可能会同时观察到亲子之间的积极同步和消极同步, 从而探讨父母不同的应对社会化行为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亲子二元同步(包括积极和消极同步)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性。

与之相关, 第二点不足主要体现在过往的理论模型未能区分实时时间轴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 而这一点对于理解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是有必要的。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在两个时间轴上既存在关联, 也存在差异。关联性方面, 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的应对社会化过程会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基于动态系统视角, 关系(如亲子关系)是由个体和个体之间跨时间(例如, 时刻, 天, 年)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的(Lougheed, 2018, 2019; Lougheed & Keskin, 2021), 而应对过程则是在当下的亲子关系之间共同构建的。二元关系状态随时间变化, 在关系内的反复互动中, 会出现稳定的亲子应对互动模式, 并影响未来的二元互动动态和儿童青少年适应性发展。初步的实证证据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 即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 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不仅可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及情绪与行为状态(Stanger, 2019), 也会影响儿童后期的适应性(Butterfield et al., 2019; Stanger et al., 2018)。同样, 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的父母应对社会化也可以影响实时时间轴上的亲子二元动态互动, 继而对儿童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这种关联性导致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在两个时间轴上可能是类似的。

差异性方面, 实时时间轴上, 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的关系, 以及亲子二元动态互动的作用模式可能会随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映射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 即体现出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效果及模式在不同年龄阶段可能存在差异。这一点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无法体现, 因此, 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时间轴, 以促进研究者深入理解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 把握应对社会化作用效果及模式随时间发展可能发生的变化。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的整合与拓展, 结合父母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相关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模型: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见图 4), 该模型整合了现有的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和动态系统理论, 综合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以及两个时间轴的结合, 提出

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不同过程机制和潜在边界条件。该模型在以往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父母与儿童青少年之间的二元动态互动作为关键机制，可以解释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即使考虑到儿童个体层面的应对过程，亲子之间的二元动态互动依然对应对社会化过程具备独特的贡献（Lunkenheimer et al., 2021; Moore et al., 2013）。

在理论层面，该模型可以提示研究者从多个时间尺度(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多个水平(儿童个体水平、亲子二元水平)上探讨应对社会化过程；在实践层面，该模型可以帮助实践者结合父母日常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倾向以及亲子实时的动态二元互动过程，捕捉到儿童应对的早期模式，进而预测儿童适应风险，及时预防和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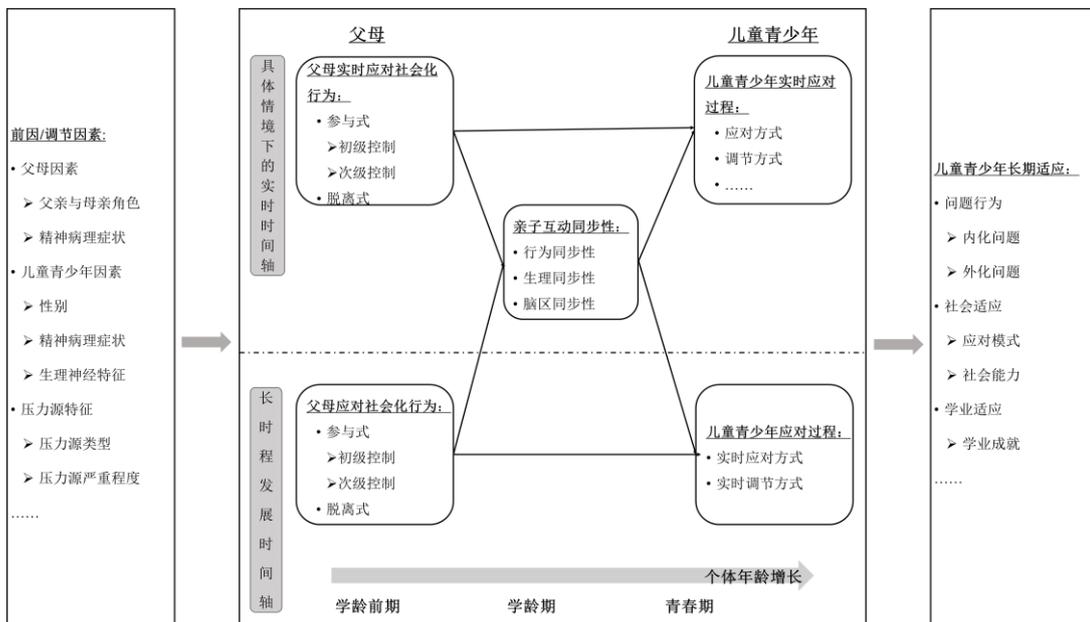


图 4 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研究提出，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沿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Kliewer et al., 2006)，父母日常和此时此刻的应对社会化行为可以通过儿童青少年日常和此时此刻的应对过程(包括应对方式和调节方式)间接预测儿童青少年适应；进一步地，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还可以通过实时的亲子行为与神经生理同步性间接预测儿童应对过程；此外，实时时间轴上的亲子互动可以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效果及模式还可能随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

该模型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 前因/调节因素：如前(理论的整合)所述，结合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成果，该模型从父母因素、儿童青少年因素以及压力源特征等角度考虑了前因/调节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作为前因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及其长期适应，也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及适应性发展之间关系的强度与方向。

(2) 潜在作用机制：模型不仅沿袭以往研究的关注点，关注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的作用，更从动态实时互动的视角出发，关注亲子二元实时应对互动状态的介导机制。首先，基于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该模型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提出儿童的应对过程(包含应对方式和调节方式等)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其次，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该模型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假设在实时的应对互动过程中，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实时应对过程，还会通过亲子之间行为、生理与神经同步性间接影响儿童实时表现，并持续影响其一系列长期发展结果。

(3) 不同时间轴上作用过程的关系：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与实时时间轴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又存在差异，彼此分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与实时时间轴的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相互关联，两个时间轴上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也存在相互影响；第二，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也可以通过实时互动中亲子的二元同步性间接预测儿童青少年日常及实时应对过程(Lobo & Lunkenheimer, 2020; Lunkenheimer et al., 2020, 2021)。实时时间轴是长时程发展时间轴的具体体现，后者则是前者的累积结果(Lougheed, 2018, 2019; Lougheed & Keskin, 2021)，二者共同影响儿童的长期适应性发展。第三，实时时间轴上，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效果与模式可能随着时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模型假设，学龄前期，儿童主要从父母处获得应对压力的资源和技能，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适应的直接作用较为明显和突出；进入学龄期后，认知能力的发展使他们在这一阶段产生更多样的应对策略，儿童逐渐有能力自己实施应对策略，但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父母的指导和建议(Stanger, 2019)。因此，该阶段更有可能体现出应对社会化的动态过程和亲子二元交互；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自我发展趋向成熟，自身具备相应的能力应对部分压力性事件，且青少年逐渐离开父母，向外寻求其他重要他人(如老师、同伴等)的建议，此时父母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有所下降和削弱(Pearl et al., 2014)。

此外，我们也同步修改了摘要和 5 研究展望的相关内容。

摘要：……本研究将此两种模型进行整合，并基于动态系统视角提出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两个层面、儿童个体和亲子二元两个水平完善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

5.2 验证与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本文提出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强调从多个时间轴(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和多个水平(儿童个体水平和亲子二元水平)两个层面探讨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适应的关系。首先，在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方面，研究沿袭应对社会化过程理论模型(Kliewer et al., 2006)，提出儿童青少年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重要机制，这一过程受到父母因素、儿童因素及压力源特征的影响。其次，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方面，研究基于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相关理论，提出父母实时应对社会化可以通过亲子二元间的同步性影响儿童青少年实时的应对过程。但这一观点是否成立，需要未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考察。最后，在不同时间轴的关系方面，基于动态系统视角下的理论，应对社会化在两个时间轴上的作用过程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Lougheed & Keskin, 2021; Ratliff et al., 2022)，又存在差异，彼此分离，这一观点能否经得起检验，也需要未来研究予以充分探讨。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审稿人 3 意见：该文以应对社会化为主题，较为详实地阐述了其内涵，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研究选题较为新颖，文章框架较为清晰，语言表达较为流畅，问题分析和展望对于后续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作者根据 2 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较为合理的修改。建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如下问题：

意见 1： 3.2 部分的第二段中，“而在孩子报告的低同伴压力下，母亲在互动中采用较多的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孩子将表现出更少的内化问题，高同伴压力下，应对社会化行为无显著效应。”这一结果与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的观点似乎是相反的，不能作为该模型的实证支持。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认真审阅和建设性意见。此项实证研究原本旨在作为对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的补充与完善，即教养×压力的交互效应可能不仅仅出现在人际压力高的情境下，由此强调在验证该模型时应当综合采用问卷、行为观察、多角色报告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但确实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解，因此，遵照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删除了与此相关的论述。希望修改后的内容可以更清晰地说明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

此两种模型的核心观点已得到初步实证支持。Abaied 和 Rudolph(2010a)发现，教养×压力放大效应模型仅适用于人际关系压力，当青少年体验到轻度人际压力时，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当青少年体验到高水平人际压力时，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显著预测男生更多的外化问题和女生更少的外化问题。教养×压力差异效应模型则在非人际压力情境中得到了验证(Abaied & Rudolph, 2010a)，对于暴露在高水平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父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青少年一年后更高的外化问题，但暴露于轻度非人际压力下的青少年，这种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行为预测了青少年一年后更少的外化问题。(见第 7 页 3.2 第 2 段)

意见 2：进一步核查语言表达问题，譬如 3.1 部分的第二段的第三句话：“父母自身的应对方式可以显著正向儿童青少年的应对方式”需要修改。

回应：感谢您的仔细审阅。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此句进行了修改。同时，本篇文章的所有作者均仔细审阅了修改稿内容，确保无语言表达问题。一些修改句例如下：

现有实证研究基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阐述了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见第 1 页第 3 段)

……但是在预测儿童青少年发展结果方面，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的作用更积极，而脱离式则主要表现为消极阻碍作用。(见第 2 页第 2 段)

Kliewer 等人(2006)针对父母如何帮助儿童应对社区暴力的问题，提出了家庭情境中应对社会化过程的理论模型。(见第 5 页 3.1 第 1 段)

……进而促进儿童在六个月后的学业成绩和自尊心……(见第 6 页第 1 段)

……儿童青少年的应对过程可能是父母应对社会化行为影响儿童青少年长期适应的重要作用机制。(见第 7 页 3.3.1 第 1 段)

未来研究可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明确中国本土化父母应对社会化概念和结构，并进一步厘清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关系。(见第 12 页 5.1 第 2 段)

意见 3: 进一步核查标点符号使用问题。譬如正文第 6 页第 2 自然段“; 和压力源的特征”。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建议。按照您的建议, 我们对修订稿中的标点符号使用问题进行了仔细审阅和修正, 以确保在修改后的文稿中不再存在此类问题。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感谢作者的回复和对论文的修改, 我没有其他的修改建议了。

编委 1 意见:

作者根据审稿人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 文章有提高。编委有以下建议供作者参考:

意见 1: 科学问题凝练不够。在自检报告中“本文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 作者给出大段回复, 不够简明扼要, 读者很难抓住要点, 请作者进一步概括凝练核心科学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这一意见十分具有启发性,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对于科学问题的阐述。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重新概括和凝练了本文的核心科学问题, 并对自检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1 本文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

答: 父母向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类应对资源(如情绪、认知、信息等)以帮助其成功应对压力, 此即为应对社会化的过程。在国内, 应对社会化是一个被忽视的家庭研究领域, 但却实实在在地在每一个家庭中存在着。例如, 儿童面临考试压力, 一些父母鼓励孩子认真复习, 查缺补漏(参与式应对社会化), 也有一些父母建议孩子不要去想这件事(脱离式应对社会化)。这些均属于应对社会化的范畴。西方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的应对社会化会对儿童青少年适应造成不同的影响, 但由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这些结论在中国家庭中是否依然成立仍需探究。

当前有关应对社会化的理论主要存在两点不足。首先, 现有的理论模型主要从儿童个体的角度阐述父母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机制, 这并不能完全捕获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过程。实际上, 儿童的社会适应结果是由亲子二元互动过程决定的(Granic, 2005), 亲子互动过程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和转变, 最终实现儿童社会适应质的变化(Lougheed & Keskin, 2021)。从这个角

度来看,父母和儿童青少年的二元互动对社会化过程具有独特的贡献(Wilson & Durbin, 2013),二元互动本身可能是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的独特机制。随着动态系统理论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兴起,研究者提出“亲子二元同步”可以作为亲子二元动态互动的有效指标(Morris et al., 2018; Perlman et al., 2022),介导父母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过程。因此,本研究拟解决的第一个科学问题是,从亲子二元互动的角度来看,亲子二元同步是否可以作为父母应对社会化影响儿童青少年适应的机制。

其次,尽管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已为我们阐明应对社会化的核心效应提供了洞见,但未能区分实时时间轴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而这一点对于理解父母应对社会化作用过程是有必要的。应对社会化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融合了实时互动和长时发展的综合持续变化过程,父母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在两个时间轴上既存在关联,也存在差异。关联性方面,具体情境下实时时间轴上的父母应对社会化过程会反馈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父母实时的应对社会化不仅可以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应对过程及情绪与行为状态(Stanger, 2019),也会影响儿童后期的适应性(Butterfield et al., 2019; Stanger et al., 2018)。同样,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的父母应对社会化也可以影响实时时间轴上的亲子二元动态互动,继而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这种关联性导致父母应对社会化的作用过程在两个时间轴上可能是类似的。差异性方面,实时时间轴上,父母应对社会化与儿童青少年应对过程的关系,以及亲子二元动态互动的作用模式可能会随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映射到长时程发展时间轴上,即体现出父母应对社会化的作用效果及模式在不同年龄阶段可能存在差异。这一点在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上无法体现。综上,本研究拟解决的第二个科学问题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包括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和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

意见 2: 文中研究展望部分有类似的问题。建议对应前文综述论点,有针对性、概括地提出展望。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指正。在修订稿中,我们基于本文的核心科学问题,重新凝练了研究展望的内容,删除了与科学问题无关的部分。修改后的研究展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5.1 考察父母应对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父母应对社会化的概念与结构,明晰其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

5.2 验证与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从长时程发展时间轴、具体情境下的实时时间轴以及两个时间轴相结合的角度,验证、丰富与完善应对社会化动态过程理论模型;

5.3 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一方面可基于健康群体和特殊群体开展应对社会化的干预训练；另一方面可采用无创神经干预技术(例如，经颅磁刺激技术，生物反馈训练)，考察亲子同步性相关的核心脑区激活及同步性改变是否因果性地影响应对社会化过程及其效果。

意见 3: 关于概念：文中首次出现应对社会化时言：“应对社会化(coping socialization)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这里很容易让人误会是指儿童青少年本人的应对社会化。文中混用父母应对社会化和应对社会化，建议统一或澄清主体，以免读者误会社会化主体所指。

回应: 再次感谢您的认真审阅和建设性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统一了全文表述，明确了应对社会化主体，以避免概念混淆。修改样例如下：

作为家庭社会化的形式之一，父母应对社会化(coping socialization)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见第 1 页第 1 段)

基于此取向的研究一致发现父母参与式应对社会化行为往往与儿童青少年积极的发展结果相关……(见第 3 页 2.1 第 1 段)

问题之一在于，父母应对社会化作用于儿童青少年适应的过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见第 6 页第 2 段)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编委 2 意见: 作者做了较好的修改和回复，文章达到了发表水平，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 选题新颖，有理论价值，有独到的研究建议。同意发表。